

税收、租金与治理：理论与检验*

马 骏 温明月

摘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普遍面临着如何提高治理水平的难题。本文从财政社会学这一独特视角，研究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对治理水平的影响。本文首先梳理了财政社会学中存在的一个隐蔽的理论假设：只有税收国家才能实现好的国家治理。然后，运用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对这一假设进行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财政社会学的这一理论假设是成立的。一个国家税收国家的特征越强，其治理质量就越高；反之，如果税收国家的特征越弱，或者租金国家的特征越强，其治理质量就越低。这一发现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国家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税收国家 租金国家 治理质量

如何提高公共治理水平，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这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过去两百年来，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各国一直不断地对政治体制和政府体制进行改革。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治理问题更是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即国家如何汲取财政收入——来研究治理问题。在这一方面，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熊彼特可能是最早的探索者。1918 年，由于认识到将政治和社会因素从财政研究中剥离后，财政学不能解释许多重大的问题，熊彼特呼吁建立一门财政社会学。自 20 世纪 70 年代，财政社会学逐渐发展起来。自财政社会学的观察角度，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不仅塑造着国家，也塑造着社会，更重要地，它塑造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不同类型的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对应着不同类型的财政国家，不同类型的财政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而形成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最后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水平。长期以来，财政社会学一直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只有税收国家才能实现好的治理。最近，莫雷教授（Moore, 2004, 2008）将这个假设首次明确地总结出来。目前，

* 本文获得中山大学 985 三期专项基金和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感谢匿名评审人中肯的修改意见。感谢王闻博士、李万新博士的建议。本文文责自负。

各种历史和案例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一假设。然而由于历史和案例研究本身的局限性，这一假设是否成立仍需更多也更系统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对财政社会学的这一基本假设进行梳理，然后运用非洲国家的数据对其进行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此假设是成立的。除了理论上的意义之外，研究发现也隐含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正如莫雷教授（Moore, 2008）所说，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改革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模式，鼓励它们更多地依赖税收而不是租金收入，将有助于提高这些国家的治理水平。对于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而言，这一研究结论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收入汲取、治理模式与治理质量

财政社会学起源于哥德谢德和熊彼特在 20 世纪 10 年代末期关于税收国家的一场争论。在目睹了“一战”后期奥地利的财政崩溃之后，1917 年，奥地利社会主义学者哥德谢德（Goldscheid, 1917）认为欧洲自 18 世纪以来建立的税收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并主张“将财产还给国家”，建立一个由公共企业来提供财政收入的财政体系。1918 年，熊彼特（Schumpeter, 1918）发表了《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对哥德谢德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尽管熊彼特也注意到税收国家面临的挑战，但他并不认为税收国家即将瓦解，同时，对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率表示质疑。然而，在这场争论中，两位学者都呼吁建立一门财政社会学，研究公共部门的财政状况及其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不过，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财政社会学才真正受到重视，并在最近发展成所谓的新财政社会学（Martin, Mehrotra & Prasad, 2009）。关于财政社会学，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在一些学者（例如 Campbell, 1993）看来，财政社会学是关于“税收和公共财政的社会学分析”；但在另一些学者（例如哥德谢德和熊彼特）眼里，财政社会学致力于发展一种新的“宏观历史范式”，一种观察和理解社会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财政社会学。

从财政社会学观察角度来看，国家财政对国家和社会的演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Goldscheid, 1917），财政体系是理解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关键，它是社会变化的重要指标和源泉（Schumpeter, 1918）。在财

政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中，财政国家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财政国家是根据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对国家进行的分类（Tarschys, 1988; Moore, 2004）。在不同的财政国家，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方式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就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也会具有不同的特点，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水平。相应地，财政国家的转型意味着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最终将导致政治和社会变迁。20世纪以来，财政国家主要有三大类型：税收国家、自产国家和租金国家。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收（Schumpeter, 1918; Tarschys, 1988）。自产国家主要是指那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广泛的国家所有制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Campbell, 1996）。租金国家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国家垄断的自然资源出口而获取租金收入的国家（Moore, 2004）。

财政社会学一直隐蔽地存在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只有真正的税收国家才能形成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最近，莫雷教授（Moore, 2004, 2008）首次将这个假设明确地总结出来，并初步阐述了其间的因果关系。关于财政变迁的政治影响，财政社会学其实有三个版本的“故事”或者理论模型。基于西方国家的国家建设经验，早期的财政社会学总结出一个可以称之为“征税——代议制模型”的理论。基于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家建设经验以及转型国家90年代以来的国家建设经验，财政社会学总结出另外两个新理论，分别可称之为“租金——国家自主性模型”和“税收讨价还价——政治民主模型”（马骏, 2011）。这三个理论都直接或者间接地阐述了这个理论假设。根据这三个理论，在不同的财政国家，其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不同，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或者国家的自主性也不同。在税收国家，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较高，国家的自主性较低；而在租金国家和自产国家则相反。这导致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而对治理模式与治理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Moore, 2004, 2008; 马骏, 2011）。

“征税——代议制模型”是财政社会学最早的一个理论，也是最流行的一个理论。它是从欧洲国家的国家建设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在欧洲的领地国家时期，统治者依赖自己的领地收入而生存，因此，一方面国家财政对社会的依赖比较小，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对社会的影响也极其有限。随着欧洲国家在近现代时期（1400-1800）转向税收国家，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开始变得越来越密集和深入，税收开始成为国家和社会互动最关键的纽带。最为关键地，在税收国家，国家变得越来越

依赖于私人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收，国家不得不与私人部门讨价还价，并在政治上对社会做出让步。同时，在税收国家，公民也会形成较高的参与政治的动机。这就迫使欧洲国家重构其财政制度和政治制度，最终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Schumpeter, 1918; Musgrave, 1980; Moore, 2004, 2008）。恰如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总结的，“税收是现代民主制度兴起的先决条件”（Musgrave, 1980: 363）。此外，为了提高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并促生纳税人的“准自愿服从”（Levi, 1988），国家不得不采取“税收换服务”的治理策略，通过向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来换取纳税人对国家税收政策的服从，并以宪政民主制度和行政理性来确保这一承诺的可靠性。如此，征税就提高了国家对公民诉求的回应性，使国家变得对公民负责。最后，相较于租金和利润汲取来说，征税是一件成本高昂的行政活动。为了汲取税收，国家还必须建立理性化的征税官僚机构来对纳税人进行监督，同时需要激励征税官僚努力工作并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以降低代理成本。实际上，各国行政理性化的发展最早都发生在征税领域，然后才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总之，征税一方面能够促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提高政治问责，另一方面能提高国家治理的理性化程度，最后提高国家的治理质量（Moore, 2004, 2008）。

如果说税收国家的国家建设经验从正面直接地分析了征税如何提高治理质量，那么租金国家的国家建设经验则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子，进而间接地支持了“只有税收国家才能实现好的治理”这一假设。

“租金——国家自主性模型”是根据一些发展中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国家建设经验总结出来的。在这一时期，一些原来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由税收国家转变成租金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性租金。由于控制了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就能够通过出售这些资源而获得租金收入。在不同时期，可以形成租金的资源是不同的，在历史上，它们曾是矿产、钻石、木材等。不过，在 20 世纪，最主要的自然资源是石油。各个石油输出国的财政收入都主要来自于国家垄断的石油贸易形成的租金收入（Moore, 2004）。由于租金是“非挣来的收入”（unearned income），租金国家就无需像领地国家和税收国家那样必须在政治上或者组织上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这就对这些国家的国家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其中的一些国家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了现代国家的建设，例如建立了代议制和选举制度，但随着向租金国家转型，其国家建设道

路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在租金国家，丰裕的资源性租金大大地降低了国家对公民或者社会的依赖，国家的自主性也很高。由于财政收入主要不是来自于直接影响个人财富的直接税（即个人所得税），租金国家的人民也不可能由此形成政治参与的动机。由于租金收入的来源比较集中而且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其收支相对于税收而言就比较容易隐藏起来，进而逃避议会的监督。最后，由于租金收入相较于税收收入来说比较容易征收，因此，租金国家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公共官僚机构的动机也比较弱。其结果是，租金国家的治理质量普遍都不高，其中一些国家甚至与糟糕的治理联系在一起（Moore, 2004, 2008）。

“税收讨价还价——政治民主模型”是根据转型国家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它一方面支持了税收国家有助于提高治理质量的假设，另一方面使得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税收国家建设的复杂性。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前苏联、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经济转型的初期，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以及不同程度的财政危机。从财政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出现赤字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正在经历一次极其深层次的财政国家转型——从原来威权主义的自产国家向民主化的税收国家转型，而不是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短暂的宏观经济绩效下降的结果，只要经济好转危机就会迎刃而解（Campbell, 1996）。然而，尽管转型国家都在向税收国家转型，但由于收入基础和政治情况不同，在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税收讨价还价模式，进而走上不同的国家建设道路。例如，在波兰，国家的收入基础主要是私有小企业和个人收入。这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相对比较高，尽管在政治上也存在冲突，但在经济与政治改革上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们能够形成共识。而在俄罗斯，一方面，私有小企业不发达，国家主要从自己所控制的能源出口等高额利润部门汲取财政收入，这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国家建设一直是在持久的、两极化的精英内部冲突中展开的。收入基础和政治情况的不同，使得这两个国家在税收政策的制定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收入讨价还价模式。波兰在解决税收冲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征求纳税人同意”的方式，让那些利益受到影响的社会群体表达他们的意见。这种将抗议政治疏导进“吸纳性制度”的做法夯实了波兰的民主制度。同时，为了获得相对分散的纳税人群体对国家税收政策的服从，波兰政府积极增强国家对社会利益的回应性，提高政府对公民的负责程度。而在俄罗斯，新税制主要针对那些利润很高的出口部门和经济

上最有效率的地区，这引起这些领域内精英们的抵制，后者认为自己应该对这些价值不菲的资产拥有权利。于是，在俄罗斯，最后发展出解决税收冲突的方法是“精英讨价还价”策略——税收政策是由国家与这些精英们单个地讨价还价而形成的，而且其中充满了特殊性优惠。由于国家控制了这些利润高度集中的部门，因此，它就不需要和工会以及其他政党进行讨价还价，也不需要通过回应公民的诉求来获取税收。当国家与各个经济精英之间的短暂合作瓦解之时，国家就会动用“强制”手段来汲取财政收入，例如普京后期对经济寡头的宣战（Easter, 2008）。由以上可见，尽管两国都在向税收国家转型，但由于它们在税收领域形成了不同的收入讨价还价模式，俄罗斯和波兰的国家建设尤其是政治民主进程就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相对而言，波兰向税收国家的转型更为彻底，更加像一个真正的税收国家，而俄罗斯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些租金国家的色彩。这使得两国的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形式不同，最终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也不同，治理质量也呈现出差异性。

二、模型建构与研究方法

对于税收国家与治理质量这个假设，财政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中已有一些历史研究和案例研究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经验支持。除了人们熟悉的关于欧洲国家在近现代时期国家建设的历史研究外，近年，比较政治学对租金国家存在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现象的研究也间接地支持这一假设。例如，乔德雷（Chaudhry, 1997）研究了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国家建设经验之后发现，尽管两国都在 1918 年后开始向税收国家转型，并走上了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但随着它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转向租金国家，其国家建设却开始出现倒退。首先，两国的征税官僚机构都开始衰退，进而使得整个政府管理的官僚化程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理性化程度都出现倒退。其次，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也开始下降。卡尔（Karl, 1997）对石油输出国的研究发现，在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财政收入太容易获得，因此，国家治理的重心都转移到分配政治上去，而不是去建立财政问责机制，以及提高国家渗透社会、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其结果是看起来非常强大的国家却常常被众多的寻租者包围，国家很难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

伊斯特（Easter, 2008）关于波兰和俄国的案例研究也直接（波兰的例子）或间接地（俄国的例子）支持了这一假设。毫无疑问地，这些历史和案例研究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的收入汲取模式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实际上，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莫雷（Moore, 2004, 2008）才能将这一假设明确地提炼出来。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比较宏大而且非常重要的理论假设来说，仅凭历史和案例研究仍不足以让人相信其有效性。这意味着，这一假设是否成立，需要更系统的经验研究，需要建立大型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关于治理质量，1996年以来，世界银行开始对各国治理水平进行测量。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出版的《政府财政统计》公布了各国政府收支的信息。然而，对于统计检验而言，仅凭这两个数据库很难建立起系统的、一致性很好的数据库：要么治理变量，要么财政收入变量，都存在大量的缺失值。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收入数据无法对税收和租金收入进行分解。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据此建立一个包括绝大部分国家的跨国数据库。不过，“非洲经济展望”项目提供了关于非洲国家的非常系统而且可以将租金和税收收入进行分解的财政收入信息。通过综合运用世界银行的治理数据和“非洲经济展望”的财政收入信息，本文建立了一个关于非洲国家的数据库，并用之来检验财政收入汲取模式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对于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这个数据库有着明显的优点。首先，只有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的财政国家的治理质量，我们才能认识财政收入汲取模式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在这一点上，非洲国家正好符合这一标准。在非洲，既存在税收国家，也存在租金国家。其次，与许多人通常认为的不同，并不是所有非洲国家的治理水平都很糟糕。这意味着，因变量本身存在着足够的变化。

本文拟检验的理论假设是：一个国家的税收国家特征越强，其治理质量就越高。反之，其税收国家的特征越弱，或者租金国家的特征越强，其治理质量就越低。当然，影响一个国家治理质量的因素有很多，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其他因素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治理质量，例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本质量和公务员制度（Haque & Azziz, 1998）、政治问责机制、政治民主化程度乃至以信任、公民精神或者以美德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氛围（参见 Adserà et al., 2000），等等。不过，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检验税收国家与治理质量这一假设，而不是系统地研究影响治理质量的各种因素。因此，在统计

检验的过程中，我们只选择了两个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民主化程度。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治理质量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存在争议。绝大部分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好的治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正的贡献（Kaufman & Kraay, 2002; Bloom et al, 2004; Olson et al., 2000）。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之所以如此致力于治理研究及其测量，就与这种信念的推动密切相关。然而，政治学家科茨和社会学家谢兰克不仅质疑世界银行治理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而且质疑库夫曼和卡雷关于治理与经济关系的结论，尤其是其中隐含的政策含义（Kurtz & Schrank, 2007a,2007b; 同时参见 Kaufman et al., 2007）。对于经济发展是否同样影响治理质量，争议则更大。库夫曼和卡雷（Kaufman & Kraay, 2002）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治理只有很弱的甚至是负的影响。其他研究者（例如 Chong & Calderon, 2000）则认为，经济增长使得国家有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制度建设并提高制度的效率，进而有助于提高治理质量。我们认为，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才能理解经济发展水平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对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为公共部门改善管理体制和供给公共服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源。由于我们研究的非洲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因此，我们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对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另一个控制变量是政治民主化程度。在这一方面，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一致，即政治民主化程度越高，政治家满足公民诉求的压力和动机就越强。本文因此假设，政治民主化程度对治理质量的影响为正。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变量进行操作化并形成明确的假设。回归模型的因变量或被解释变量是非洲各国的治理质量。我们选择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标来定义和测量治理质量。该指标体系从六个维度界定和测量了各国的治理水平：公民诉求与问责、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政府的有效性、管制质量、法治、腐败控制。对于每一个治理维度而言，取值范围为-2.5 到 2.5，分值越高代表治理质量越高，反之则反是。从 1996 年到 2002 年，世界银行每两年发布一次各国的治理指数；2002 年以来，每年发布一次。^①对于各个非洲国家，我们将六个维度的分值加总后取其均值来测量该国总体的治理质量。回归模型的解释性变量是非洲各国根据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呈现出来的财政国家特征。“非洲

^①关于世界银行治理指标体系及其数据，下载自：<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

经济展望”公布了 1996 年-2008 年非洲各国的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间接税（增值税、销售税等）、贸易税（主要是关税）、其他税、非税收入（例如收费）、总财政收入（扣除了捐赠）。总财政收入是前面各项收入之和，单位为 10 亿美元（当前值）。我们将各国的直接税、间接税、贸易税加总，得出它们的税收收入。同时，根据该机构的定义，其他税是指各种与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开采和粗加工相联系的税收收入。这实质上是各种以税收形式存在的租金收入。^①根据此数据，我们对非洲国家的财政国家类型进行了两种操作化。首先，我们计算了这些国家的税收租金比（即税收收入除以租金收入，简称税租比），并取对数。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 10 个国家在某些年份完全没有租金收入，即租金收入为 0，无法计算税租比。然而，若将这些观察值当成缺失值处理，不仅会导致数据损失，而且在理论上也不恰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恰恰是最典型的税收国家。因此，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我们将其当年的租金收入处理为 0.0001，然后再计算它们的税租比。只有当个别国家当年的税收收入和租金收入都为 0 时，我们才将它的税租比当成缺失值。根据财政社会学，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的税租比与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关系。

假设 1: 一个国家的税租比越大，它的治理质量越高。

其次，根据各国税收收入和租金收入在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我们创设了“财政国家 I”这个变量，具体包括三种类型的财政国家：租金国家、混合财政国家、税收国家，分别赋值为 1、2、3。从 1 到 3，表明一国税收国家的特征越强。具体划分标准详见表 1。此外，在我们的分类中，有三个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突尼斯——的情况比较特别：在某些年份，它们的税收和租金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均小于 45%。本文对这三个国家进行了特殊处理。只要它们的税收收入比重超过租金收入比重 15%，即将其归为税收国家。在数据库中，不存在相反的情况。最后，为了更好地比较税收收入与租金收入对治理质量的影响，我们在数据库中剔除混合财政国家，创设了“财政国家 II”这个变量。这是一个虚拟变量（0，1）：1 为税收国家，0 为租金国家。根据财政社会学，我们形成理论假设 2。

假设 2: 一个国家在财政国家类型上越偏向税收国家或租金国家

^①关于“非洲经济展望”的财政收入构成及其数据，下载自：<http://www.africaneconomicoutlook.org/en/database-on-african-fiscal-performance/>

的特征越强，它的治理质量越高。

表 1 财政国家类型的划分标准与赋值

财政国家类型	赋值	划分标准
租金国家	1	租金收入比重 $\geq 55\%$ 且税收收入比重 $\leq 45\%$ 。
混合财政国家	2	$45\% < \text{租金收入比重} < 55\%$ 且 $45\% < \text{税收收入比重} < 55\%$ 。
税收国家	3	a. 税收收入比重 $\geq 55\%$ 且租金收入比重 $\leq 45\%$ 。 b. 税收和租金收入比重皆小于 45% ，但税收收入比重超过租金收入比重 15% 。

注：(1) 突尼斯 1998 年的租金比重为 18.3%，税收比重为 49.8%，小于 55%。但是，由于其税收收入比重比租金收入比重高 31.5%，将其归为税收国家。

(2) 突尼斯 1996 年的租金比重为 36.1%，税收比重为 46.2%，不符合税收国家的标准 b。但鉴于其税收比重不够高，租金比重也不特别低，所以将其视为混合国家。

对于政治民主化程度，我们采用“政治类型 IV 项目：政体特征和变迁，1800-2009”的测量及其数据创设了“政体类型”这一变量。^① 该项目主要用来测量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性质，它采取 21 分值的测量体系：取值介于-10 到 10 之间，最小值-10 是世袭君主制，最大值 10 是巩固的民主制。从负值到正值表明一个国家政体趋向民主化，分数为正值比分数为负值的民主化程度高，分值越大表明越靠近民主政体。然而，在三种情况下，政体性质有三个特殊的赋值：政治上处于暂时的中断期(interruption)赋值为-66，处于政权更迭期(interregnum)赋值为 -77，处于政治转型(transition)的政体被赋值为-88。从 1996 年到 2008 年，在 50 个非洲国家的 500 个观察值中，有 15 个观察值具有这种特殊赋值：有 11 个观察值的赋值为-88，涉及 6 个国家；有 4 个观察值的赋值为-77，涉及 3 个国家。由于这三种特殊值严重偏离了 21 分值的测量体系，我们对其进行了处理。根据该数据库的分类体系，这些政体分值可以分为三类：独裁政体 (autocracies, 从-10 到 -6)、难以归类的非民主政体 (anocracies, 从-5 到+5, 或者三个特殊赋值)，民主政体 (democracies, 从+6 到+10)。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政体类型编码成一个虚拟变量 (0, 1)：1 为民主政体 (政体分值从+6

^① 该数据库名称为 “The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09” (下载自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近些年来，这一直是一个广泛运用的政体类型数据库。

到+10)，0为各种非民主政体（政体分值从-10到+5，以及三个特殊赋值）。需要指出的是，在测量政治民主化程度时，我们没有采用另一个同样比较常用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开发的政治自由指数。这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在测量治理指数的第一个指标时（即公民诉求与问责），已经运用了这个数据。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用人均GDP来测量，并取对数。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单位为1美元（当前值）。^①对于这两个控制变量，我们形成以下两个理论假设：

假设3：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将会带来治理质量的提升。

假设4：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高，它的治理质量越高。

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包括50个非洲国家从1996年到2008年的数据库。选取这样的时间范围是因为：（1）世界银行是从1996年才发布各国的治理指数。（2）尽管世界银行已经公布了2009年和2010年各国（包括非洲国家）的治理指数，但“非洲经济展望”公布的财政收入数据是从1996年到2008年的，也就是说，最新的财政收入数据只到2008年。但是，这个数据库缺乏均衡性，不能满足面板数据时间序列连续平稳性的要求。具体来看，从1996年到2002年之间，治理指数是每两年发布一次，缺乏1997年、1999年和2001年治理质量的数据。因此，在对这个数据库进行分析时，我们没有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而是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同时，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可能存在内生性的自变量滞后一期后再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这主要涉及税租比、财政国家I、财政国家II和人均GDP。在我们的模型中，它们都是自变量，但是，它们都可能与因变量（即治理质量）互为因果。随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包括50个非洲国家从2002年到2008年的面板数据。该数据库在时间序列上是连续的。经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我们采用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滞后一期的税租比、财政国家I、财政国家II和人均GDP作为工具变量再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此外，在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中，我们都使用Newey-West估计程序来处理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主要采用Stata.11进行数据分析。

三、非洲国家的治理质量与财政收入

^① 该数据下载自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

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国家的基本情况，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本节首先描述非洲各国的治理质量、财政收入汲取方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体性质，并初步比较不同类型的财政国家的收入汲取方式与治理质量。

表2描述了非洲国家的治理质量、税租比、租金收入比重、税收收入比重、人均GDP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标准差，以及政体类型、财政国家类型的基本情况。

表2 描述统计分析

	1996年-2008年					2002年-2008年				
	观察值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观察值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治理质量	500	-2.251	.837	-.610	.603	350	-1.796	.837	-.600	.581
税租比	493	-3.869	13.779	3.372	3.508	350	-3.869	13.779	3.400	3.683
税收比重	500	0	1.000	.703	.269	350	.0181	1.000	.705	.266
租金比重	493	0	.934	.178	.270	350	0	.934	.187	.282
财政国家I	493	1	3			350	1	3		
财政国家II	472	0	1			335	0	1		
政体类型	440	0	1			308	0	1		
人均GDP	500	4.352	10.244	6.572	1.188	350	4.449	10.244	6.690	1.215

注：表中税租比和人均GDP取的是对数。

从表2可见，整体上看，非洲国家的治理水平不高，或者说不是很好，治理均值是-0.60或者-0.61。此外，最高的治理分值是0.84，这说明从1996年到2008年间，整个地区没有治理分值超过1的政府。某些国家在个别年份甚至是全球治理最糟糕的国家，治理水平的最小值是-2.25（1996年-2008年），靠近最低值-2.5。对此，非洲的政治家非常清楚。2010年，由盖茨基金会和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非洲政要参加的“非洲进步小组”发布了“非洲进步年度报告”。在该报告中，参会者发出这样的呼吁：“好的治理和问责将决定非洲的未来”（African Progress Panel, 2010: 3）。当然，并非所有非洲国家的治理都很差。根据世界银行治理指数，从2005年到2009年这一段时间，有47%的非洲国家的治理质量都出现了改善的趋势（African Progress Panel, 2010:

16)。图1是从1996年到2008年非洲各国治理质量的箱型图，它更详细地展示了非洲各国治理质量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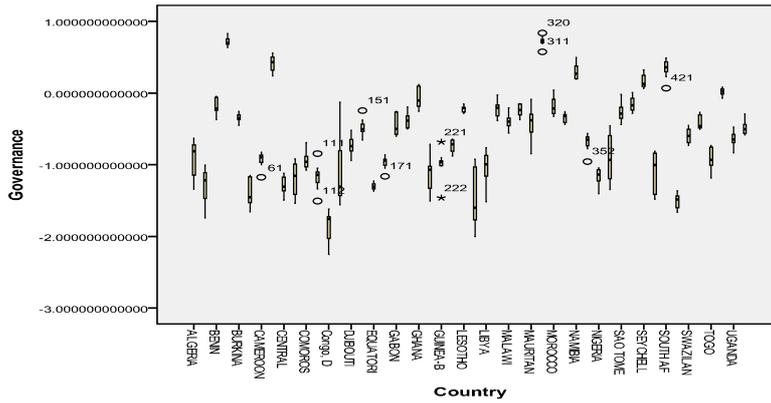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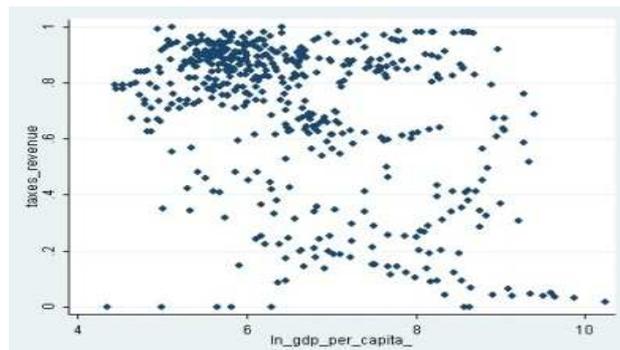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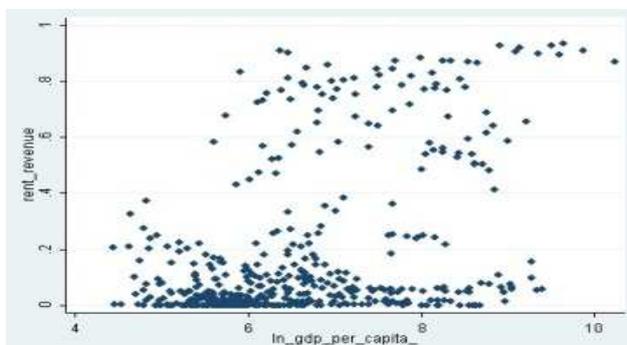


图1 非洲各国的治理质量（1996-2008年）

图2描述了1996-2008年间，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非洲国家的税收收入和租金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如图2a所示，大部分非洲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例如南非、埃及、布基纳法索、布隆迪、贝宁等。但如图2b所示，也有不少非洲国家高度依赖租金收入，例如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安哥拉、赤道几内亚等。



(2a)税收比重



(2b) 租金比重

图2 非洲国家税收与租金收入比重 (1996-2008年)

图3描述了1996-2008年间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非洲国家的税租比(取对数)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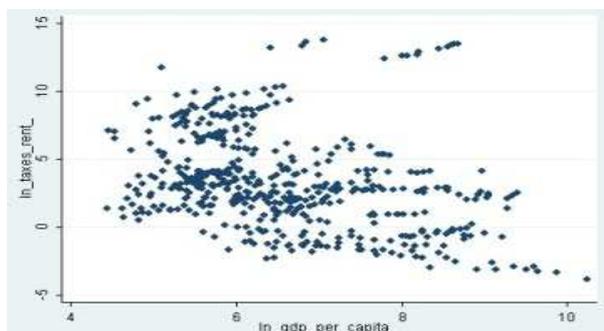


图3 非洲国家的税租比 (1996-2008年)

表3比较了不同类型财政国家的收入汲取方式。税收国家对租金收入的依赖极其小。在税收国家，租金收入比重的均值是.056，即不到6%。然而，租金国家平均起来却有20%的税收收入。这表明，即使这些国家的租金收入很丰裕，但也难以支持全部的政府支出。当然，这也说明，即使是租金国家，它们也不会完全放弃征税。

表3 三类财政国家的收入汲取方式比较 (1996-2008年)

	观察值	税收比重	租金比重	税租比
--	-----	------	------	-----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租金国家	73	.203	.109	.761	.111	-1.514	.855
混合国家	21	.417	.078	.481	.061	-.153	.303
税收国家	399	.822	.123	.056	.074	4.451	2.979
总计	493	.713	.257	.178	.270	3.372	3.508

表 4 比较了不同财政国家的治理质量。税收国家的治理质量普遍要高于租金国家，混合财政国家的治理质量也比租金国家高。恰如各种案例研究指出的，租金国家的治理质量非常糟糕。然而，三类财政国家治理指数的均值都是负值，即使是税收国家，它们的治理指数均值也是负值。这进一步说明，非洲国家的治理质量普遍不高。而且，混合财政国家治理指数的均值大于税收国家的均值。这意味着，尽管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很重要，但它只是影响治理质量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同样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治理质量。

表 4 财政国家的治理质量（1996-2008 年）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国家数
租金国家	-1.060	.432	-1.743	.700	73
混合国家	-.313	.918	-1.485	.831	21
税收国家	-.530	.561	-2.251	.837	399
总计	-.599	.596	-2.251	.837	493

四、统计检验

尽管 1996 年-2008 年的数据库存在缺陷，即因变量缺乏连续性，但为了充分利用数据，我们对该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表 5 报告了三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这三个模型中，因变量都是治理质量，解释性变量分别是税租比、财政国家 I 和财政国家 II，控制变量都是人均 GDP 和政体类型。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用滞后一期的税租比、财政国家 I、财政国家 II 以及人均 GDP 来对治理质量进行估计。统计结果表明，三个模型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它们分别能解释治理质量 48%、60%和 58%的变化。此外，模型不存在共线

性。在各个模型中，作为解释性变量的税租比、财政国家 I、财政国家 II 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而且都对治理质量有着正的影响。同时，控制变量人均 GDP 和政体类型也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 1996 年-2008 年的数据库存在缺陷，在此仅简单报告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 5 非洲 50 个国家治理质量多元回归分析（1996-2008 年）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数项	-2.335*** (.137)	-3.634*** (.167)	-3.122*** (.147)
Lag1(税租比)	.050*** (.006)		
Lag1(财政国家 I)		.384*** (.028)	
Lag1(财政国家 II)			.761*** (.056)
Lag1(人均 GDP)	.219*** (.020)	.294*** (.019)	.276*** (.019)
政体类型	.523*** (.046)	.447*** (.041)	.407*** (.041)
R ²	.48	.60	.58
N	384	391	374
Prob > F	.000	.000	.000

注：（1）***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是标准差。

（2）税租比和人均 GDP 取对数。

基于 2002 年-2008 年的面板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了非洲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对其治理质量的影响。表 6 报告了三组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4（包括模型 4a 和 4b）的解释性变量是税租比，模型 5（包括模型 5a 和 5b）的解释性变量是财政国家 I，模型 6（包括模型 6a 和 6b）的解释性变量是财政国家 II。各个模型的控制变量都是人均 GDP 和政体类型。对于每一组模型，我们同时采用了两种统计分析方法：（1）根据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回归分析，其结果见模型 4a、模型 5a、模型 6a。(2) 为了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税租比、财政国家 I、财政国家 II 和人均 GDP 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然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结果进行估计，其结果见模型 4b、模型 5b、模型 6b。模型保留了固定效应。各模型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而且不存在共线性。此外，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各个模型都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表 6 非洲 50 个国家治理质量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2002-2008 年)

	模型 4a (FE)	模型 4b (2SLS)	模型 5a (FE)	模型 5b (2SLS)	模型 6a (FE)	模型 6b (2SLS)
税租比	.020*** (.007)	.031*** (.011)				
财政国家 I			.138*** (.034)	.210*** (.078)		
财政国家 II					.438*** (.054)	.467*** (.046)
人均 GDP	.019 (.026)	-.003 (.028)	.039 (.025)	.037 (.030)	.048* (.025)	.042 (.028)
政体类型	.162*** (.059)	.168*** (.061)	.158*** (.057)	.158*** (.058)	.155*** (.057)	.157*** (.058)
R ²	.13	.12	.14	.13	.16	.16
Hausman test Prob>chi2	.000		.000		.000	
N	308	308	308	307	292	284
N. of code	44	44	44	44	43	42
F test (Prob > F =)	.004	.004	.000	.001	.000	.000

注：(1) ***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是标准差。

(2) 税租比和人均 GDP 取对数。

模型 4a 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该模型能解释治理质量 13% 的变化。税租比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前者增加一个百

分点将使后者上升 0.020 个百分点。政体类型也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将使治理质量上升 0.162 个百分点。不过，人均 GDP 在统计上不显著。加入工具变量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 4b 的估计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 4a 基本一致。在模型 4b 中，税租比和政体类型仍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且同样对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系数值也与模型 4a 的估计值基本相同。同样地，人均 GDP 在统计上不显著。此外，模型 4b 的拟合优度只比模型 4a 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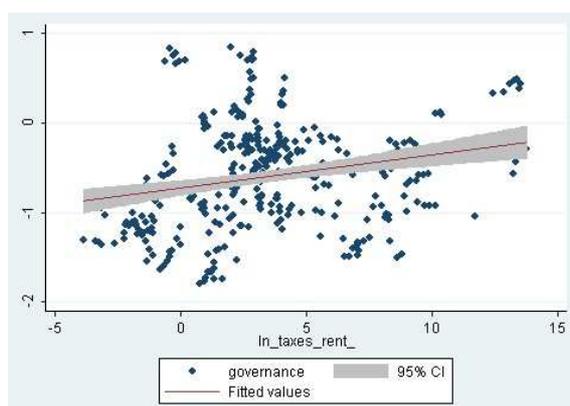
下面考察财政国家类型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 5a 的解释性变量是财政国家 I，该模型能解释 14% 的治理质量的变化。在该模型中，财政国家 I 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随着一个国家从租金国家向混合财政国家以及税收国家转型，它的治理质量将提高 0.138 个百分点。政体类型也对治理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影响，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将导致治理质量上升 0.158 个百分点。人均 GDP 仍然不显著。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后，模型 5b 的估计结果与模型 5a 基本一致。财政国家 I 和政体类型对治理质量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在系数值方面，政体类型的系数值完全相同，财政国家 I 的系数值出现上升，但升幅不大。人均 GDP 仍然不显著。最后，模型 5b 的拟合优度只比模型 5a 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在模型 6a 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中，财政国家 II 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随着一个国家从租金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治理质量将提高 0.438 个百分点。政体类型也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将使得治理质量上升 0.155 个百分点。引入工具变量后，模型 6b 的估计结果与模型 6a 的基本一致。财政国家 II 和政体类型对治理质量的影响仍然是正向的，系数值也基本一致。最后，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都是 15%。唯一的变化是，人均 GDP 在模型 6a 中是显著的，但在模型 6b 中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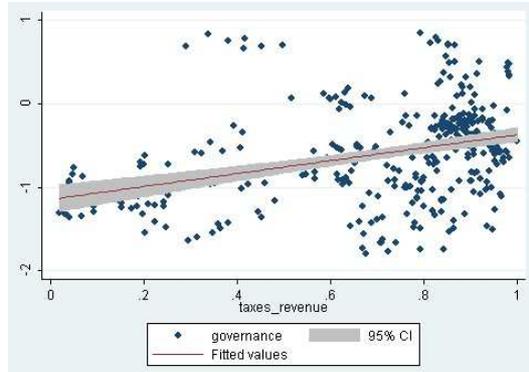
总之，基于 2002 年-2008 年面板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非洲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对它们的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影响，税收国家对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这一理论假设获得了验证。税租比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理论假设 1 获得经验支持。财政国家 I 和财政国家 II 也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理论假设 2 通过了统计检验。将模型 5 和模型 6 进行对比，可以更好地观察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对治理质量的影响。无论是在固定效应估计还是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

中，财政国家 II 的系数值都要比财政国家 I 大得多。这说明，如果剔除混合财政国家，只将税收国家和租金国家进行比较，从租金国家到税收国家将极大地提升治理质量。此外，由于政体类型对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理论假设 3 也通过了统计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 6a 和 6b 中，财政国家类型的系数值都比政体类型的系数值大。这说明，如果只在租金国家和税收国家以及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之间进行比较，财政国家类型对治理质量的影响比政体类型的影响更大。在各个模型中，除模型 6a 外，人均 GDP 都不显著。理论假设 4 没有获得很好的经验支持。这说明，较好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伴随着好的治理水平。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表 6 中各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在 12%-16% 之间。这比表 5 中的拟合优度低许多。不过，这反而更加可信。因为影响一个国家治理质量的因素很多，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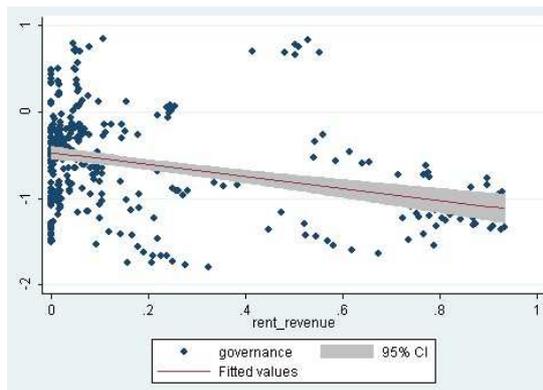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图 4a 以散点图的形式呈现了税租比与治理质量的关系。如其所示，税租比与治理质量呈正相关关系。由于财政国家类型是根据税收收入和租金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来划分的，图 4b 和 4c 分别为呈现了税收比重、租金比重与治理质量的散点图。税收比重与治理质量呈正相关关系，租金比重与治理质量呈负相关关系。



(a) 税租比与治理质量



(b) 税收比重与治理质量



(c) 租金比重与治理质量

图 4 财政收入汲取方式与治理质量散点图 (2002-2008 年)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财政社会学关于只有税收国家才能实现好的治理这一假设是成立的。至少，基于非洲国家数据的假设检验支持这一理论假设。恰如莫雷教授指出的，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通过改革财政收入体系，治理质量很差或者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的国家可以实现好的治理。为了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质量，应该鼓励这些国家主要依靠税收来汲取财政收入，走向真正的税收国家，而不是主要依靠那些容易获得或者不需要在政治上和行政上付出太大努力就能

获得的财政收入，例如租金收入（Moore, 2007, 2008）。在税收国家，国家主要通过向私人部门（私人企业和家庭）征税来汲取财政收入。尽管这会增大国家对社会的依赖，但它在建构国家的同时也能够塑造出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公民意识。实际上，正是在围绕着征税而展开的国家与社会的密集且动态的互动中，公民身份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正如亚当·斯密（1776）指出的，征税提供了一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人民形成“一种被包括进一个共同的公民身份的情感”（转引自 Martin et al., 2009: 1-3）。同样地，尽管这样会降低国家的自主性，但是，选择这样的国家建设道路也会使得国家更加对社会负责，进而提高国家治理的正当性。最后，尽管这样汲取财政收入需要支付较高的行政成本，但这也相应地增加国家能力的强度。正如福山指出的，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国家能力的强度比国家职能的范围更重要。而国家从社会中汲取税收的能力比通过出售资源或者通过垄断来获得财政收入更能说明国家能力的强度（福山，2007: 20-21）。

对于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来说，这一研究发现有着重要的启示。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开始从自产国家——主要以国有企业为核心来汲取财政收入——向税收国家转型。然而，即使只考虑预算内收入，中国仍只是一个“半税收国家”。在向税收国家转型的同时，中国还保留了自产国家的遗产，同时兼具一定的租金国家特征。在未来，随着税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土地出让金这种租金收入的逐步淡出，中国将不再具有租金国家的特征，中国将进一步向税收国家转型。不过，由于历史惯性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有企业将继续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仍将是一个混合型财政国家，即税收国家和自产国家的混合（马骏，2011）。最近，不仅中央国企的利润继续上升，而且不少地方都在推行“做大做强”国企的战略。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以及日益分化的社会，国家应该掌握一部分对社会依赖程度较小的资源，以确保国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从而能有效地应对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与风险。因此，那种主张将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然而，目前更让人担心的是，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进一步“做大做强”国企。暂不讨论这样做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例如是否会使得经济改革出现倒退。本文想表达的是，这样做将对中国的国家建设以及治理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正如财政社会学告诉我们的，在很大程度上，国企利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国家建设的影响，与租金收入造成的影响是相

同的，它们都会过度增加国家的自主性，减少国家对社会的依赖，从而降低国家对社会诉求的回应性（Campbell, 1996; 马骏, 2011）。而且，正如 20 世纪 80 年代尤其是在此之前的自产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如果国企的面铺得过宽过大，国企利润就不可能对国家财政做出正的贡献。总之，我们以为，国家可以、也应该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掌握国有企业，但不应过度地做大国企。同样地，像土地出让金这样的租金收入如果规模过大也会对国家建设和治理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仍然只是初步的。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建立更大的跨国数据库，对这个理论假设进行再检验。即使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将来若能获得 2008 年以后的财政收入数据，也需要建立一个时间序列更长的数据库来对理论假设进行再检验。此外，似乎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个理论可否用来研究一个国家内部各个地方的治理质量。例如，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财政对这些资源的依赖程度如何，这种依赖会对治理产生何种影响，是否也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强调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方式会对治理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绝不等于说，国家治理的改进仅仅依靠财政改革就能实现。最后，本文的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了许多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即政治民主化对于治理质量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点也对中国的国家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 弗朗西斯·福山，2007，《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马骏，2011，《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研究：走向税收国家？》，《吉林大学学报》第 1 期。
- Adserà, Alicia, Carles Boix & Mark Payne 2000, "Are You Being Serve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438.
- African Progress Panel 2010, "From Agenda to Action: Turning Resources to Results for People." <http://www.africaprogresspanel.org/en/our-work/annual-reports/annual-report-2010/>.
- Bloom, David, David Steven & Mark Weston 2004, "Governance Matters: 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Economics* 5 (4).
- Campbell, John 1993, "The State and Fiscal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
- 1996,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Fisc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n John Campbell & Ove K. Pedersen(eds.), *Legacies of Chang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Chaudhry, K. A. 1997, *The Price of Wealth: Economi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hong, Alberto & Cesar Calderon 2000, "Causality and Feedback Between Institutional Meas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2(1).
- Easter, Gerald M 2008, "Capacity, Consent and Tax Collection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In Deborah A. Brautigam, Odd-Helge Fjeldstad & Mick Moore(eds.), *Taxation and State-buil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scheid, Rudolf 1917,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Problems of Public Finance." In Richard A. Musgrave & Alan T. Peacock [1958] (eds.), *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Haque, Nadeem & Jahangir Azziz 1998,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Secondary-Generation Civil Service Reform in Africa." IMF Working Paper WP/98/164.
- Karl, T. L. 1997, *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Stat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aufman, Daniel & Aart Kraay 2002, "Growth without Governa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928.
- Kaufmann, Daniel, Aart Kraay & Massimo Mastruzzi 2007, "Growth and Governance: A Reply." *Journal of Politics* 69(2).
- Kurtz, Marcus J. & Andrew Schrank 2007a, "Growth and Governance: Models, Measures, and Mechanisms." *Journal of Politics* 69(2).
- 2007b, "Growth and Governance: A Defense." *Journal of Politics* 69(2).
- Levi, M. 1988,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tin, Issac W., Ajay K. Mehrotra & Monica Prasad 2009, "The Thunder of Histor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New Fiscal Sociology." In Issac W. Martin, Ajay K. Mehrotra & Monica Prasad(eds.), *New Fis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Mick 2004, "Revenues,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5(3).
- 2007, "How Does Taxation Affect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D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Policy Brief* Issue 34(March).
- 2008, "Between Coercion and Contract: Competing Narratives on Taxation and Governance." In Deborah A. Brautigam, ODD-Helge Fjeldstad & Mick Moore (eds.), *Taxation and State Buil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sgrave, Richard A. 1980, "Theories of Fiscal Crises: An Essay in Fiscal Sociology." In Henry J. Aaron & Michael J. Boskin(eds.), *The Economics of Taxation*.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Olson, Mancur, Naveen Sarna & Anand V. Swamy 2000, "Governance and Growth: A Simple Hypothesis Explain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Growth." *Public Choice* 102.
- Schumpeter, Joseph A. 1918. "The Crisis of Tax State." In Richard Swedberg [1991](eds.), *Joseph Schumpeter: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rschys, Daniel 1988, "Tribute, Tariffs, Taxes and Trade: The Changing Sources of Government Revenu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杨 典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